

日本与中国的交往,古已有之。但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涌现,却是明治维新以后。彼时的日本,正在急剧西化中,文人厌恶国内的西洋情调,与之相抵,便宣扬“中国趣味”。于是,随着1918年海陆交通的发展,加之在军事上控制了朝鲜、东北这一通往东亚大陆的要津,日本国内掀起一场中国旅游热,文人政客纷纷买船游去,寻找李杜苏白笔下的诗意中国。

浙江文艺出版社近日出版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20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雷域鸿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五种。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日本中国观之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个令人颇为陌生的近代中国的面貌。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100年前,日本文学大师在中国看到什么

谷崎润一郎: 唯美的秦淮之夜



谷崎润一郎一生仅出国两次,两次都是到中国去。

第一次是1918年,他先到朝鲜半岛,后经由“满洲”到达内地,在北京、汉口、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等地周游了两个月。这次“参照铁道院的导览手册和地图信步而行”的游客之旅,大大满足了作家的“中国趣味”。回国后陆续发表的《庐山日记》《秦淮之夜》《苏州纪游》《西湖之月》等,就是这次旅行的记录。

在来中国之前,谷崎润一郎就偏爱书写中国。1909年刊登在《新潮》上的出道之作《麒麟》,直接取材自《史记·孔子世家》和《论语·雍也篇》,讲述孔子传道途经卫国时,试图说服卫灵公远美色、专心治国而未遂的故事。故事的真正主角却是南夫人,她奉行享乐主义的态度,开启了谷崎不惜因美而废道的极端唯美追求。

很少有日本作家在来到中国之后仍然像谷崎那样,延续对中国的美好想象。肮脏、污垢、妓女、苦力、乞丐,这些是大正作家如菊池宽、芥川龙之介描述中国常用的关键词,但谷崎润一郎回忆两个月的中国之行,相当满足——“有人问我其中何处最有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是南京、苏州、上海这一带。那一带从北方看来景色非常秀美,树木茂盛,人也长得漂亮。火车设施等也相当不错,气候也深为宜人。我到南京去正好是十月二十日前后,秋蝉还在鸣叫。杨柳依然如春天般地妩媚多姿,给人一

种难以言状的快适感。越往南方走,就越舍不得在朝鲜、中国的满洲一带花钱。以后想在春季再度去中国一游。”

大概是对第一次中国之行甚为满意,同时又为了弥补那次没能“见一些新的文人作家”的遗憾,1926年,谷崎怀着“中意的话盖一院房子也好”的理想,直抵上海。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通过内山书店店主内山完造,结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等文化人。与中国年轻作家、艺术家们的交往,谷崎了解到中国苦于殖民地化的现实。

谷崎在上海期间,恰逢中国的旧历新年,田汉怕他一个人寂寞,执意带了他来到欧阳予倩的家里过年。欧阳全家热情接待了谷崎和田汉,大家一起吃了年夜饭。这顿充满了湖南乡情的年夜饭,使谷崎沉浸在了儿时的回忆中,他后来在给田汉的一封信中,语调真切地叙述了自己在欧阳家里度过的这一个难忘的中国新年。回国以后谷崎撰写《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记录这次行程。

由于此后中日关系交恶,谷崎与中国友人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他也没有再踏上中国的土地。1956年欧阳予倩率中国京剧团访问日本时,谷崎闻讯特意从热海赶到欧阳在箱根下榻的旅馆,畅叙阔别之情,欧阳也极为感动,当即赋长诗一首赠谷崎,抵达东京后再用毛笔书写,将纸卷请人送抵热海,谷崎将其裱装后挂在自己的居所今雪后庵的客厅里。

村松梢风的 原乡之旅



受到芥川龙之介的刺激,不太成功的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决定前往中国寻找灵感。芥川那夸张的、多少有些奇异的文字无疑打动了梢风的心。

梢风的第一次中国行是在1923年,一来即被上海的魅力吸引,此后十年间,几乎每年都要造访中国。在《梦寐之乡》一文中,梢风写道:“每次溯入长江,不知何故,此时无限的亲切、喜悦、感激等诸般心情一下子都涌上心头,最后变成一种舒畅的伤感,禁不住热泪盈眶,沧然而涕下。”这一刹那自心灵深处涌发出的“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动,差不多成了梢风以后感受中国、观察中国的一个基本支点,但并不是所有日本人都会拥有这种文化寻根式的感动。

1928年10月,梢风再度来到中国,这次他主要将目光转向南京,要亲眼观察一下北伐革命之后国民党新政权下的中国面貌。

梢风徜徉于庶民气息浓厚的茶馆和书场,在六朝遗迹中留下履痕处处,也去访问了曾留学日本的国民革命军军医总监陈方之、南京市市长刘纪文,对国民革命后的新气象颇有赞叹。他还拜访了一位栖居在秦淮画舫中的陆军师长,政府的艺伎禁令之下,云集河中的秦淮画舫成了无用的废物,而由于南京人口激增,房子满足不了市场供应,这些带有厨房、卧室的豪华画舫有的便被当成房屋租了出去。

他对初步建成的宏大的中山陵惊叹不已,“获悉现代中国也还是有伟大的艺术,内心感到难以言状的欣慰。”可当看着荒草凄迷中的明孝陵,他又不禁慨叹:同样是创下了恢复汉民族主权的不可磨灭的明太祖和孙中山的境遇差别未免太大,他认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也应该在今天对明陵多少加以修缮保护,这也是对祖先应尽的义务。”

总之,他感受到一种新,基本是处在一种虚饰的气象。他一方面感到某种鼓舞,一方面却有一种怅然若失之感。

相比较而言,梢风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描述不管如何五色杂陈,却始终带着一种温情,没有芥川那样的冷眼。但在“1·28上海事变”之后,村松梢风还是表现出在作为作家之前他首先是个“日本人”,开始鼓吹对华侵略,这也是那一时代大多数日本人难以逃脱的宿命。比如曾用日文改写了多少中国古代小说,参与过《大鲁迅全集》的翻译、与郁达夫、田汉等曾相交颇厚并两次来中国游历的佐藤春夫,在上海事变后不久,就逐渐沦为“大东亚战争”的吹鼓手。而像谷崎润一郎那种,为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沉浸于关西风土人情创作而被视作“反战”作家的,并不多见。

这套丛书策划的初衷,一是借助这些当时人的眼睛,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即使经过他人之眼的“观看”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些变形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借鉴;二是在这些变形中理解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具体地、理性地认识当时的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周边地区的关系;第三则是提供一种有思想、有内涵,又兼具可读性的文学作品,因此所选作者以文学家为主,而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作品,则在思想、见识、视野、深度等方面更显所长。

——日本文学翻译家、丛书策划 施小炜

芥川龙之介: 幻灭的中国之行



我们谈到芥川龙之介,往往会说到中国文化对他的影响,说他喜欢《西游记》,喜欢《水浒传》,说他中学时代的汉语水平超常,但看他这部《中国游记》,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1921年春天,芥川以大阪每日新闻特派记者的身份环游中国一百二十天。在来中国的途中,他发现同船的旅客都在晕船,一个个痛苦不堪,除了一个高大的美国佬。芥川以非常羡慕的口气写道:“那个美国人简直是个怪物”,不仅照样吃喝,饭后“还在船上的客厅里敲了一会打字机”。这一段带有赞赏意味的描写,作为一本书的开场白,似乎也影射了当时世界局势。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大英帝国日薄西山,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只有美国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发户。

在日本人最为青睐的苏杭一带,跟着唐诗游览的芥川,感受到的是彻底的失望。清末重修的山寺,“俗不可耐,什么月落乌啼,何从谈起”;扬州城则破败不堪,纵然“腰缠十万里”到此一游,也定会索然无味;秦淮河“乃平凡之污水沟也……古人云:‘烟笼寒水月笼沙’,此般风景已不可见。今之秦淮,可曰乃俗臭纷纷之柳桥也。”当然行迹所到也有令他心仪的地方,比如底蕴深厚的老北京。旅途中,他在写给友人的书

简中抒发了对北京的留恋之情:“北京不愧是皇城之地,就是在这里住上两三年亦无妨。”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常常显得非常冷眼,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境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公然冲着风景区的池塘撒尿的游客,大街上麻木不仁的乞丐,以及尤为日本人深恶痛绝的随地吐痰等不良生活习惯等等。比如他在写戏曲名角绿牡丹时,“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此之外,更令芥川介怀的还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固然带有晋升为列强之国民的优越感,但一些所言虽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实,不必为讳。